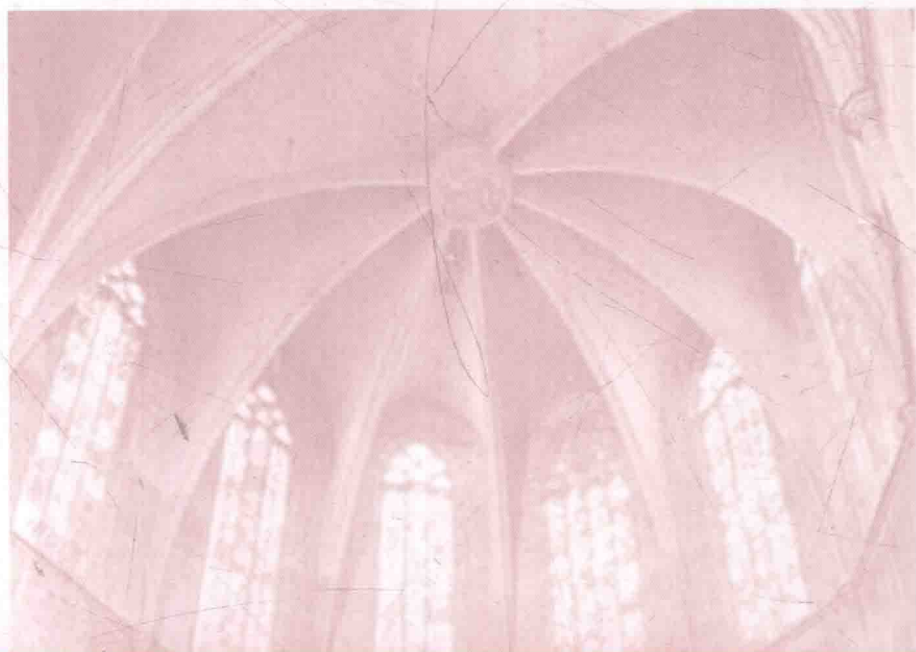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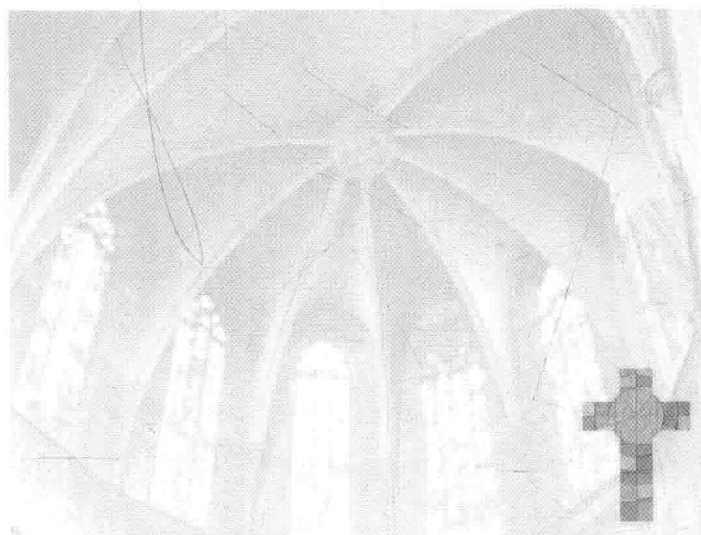
HUABEI DIQUDE SHENGGONGHUI

华北地区的圣公会

左芙蓉 ©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HUABEI DIQUDE SHENGGONGHUI

华北地区的圣公会

左芙蓉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北地区的圣公会 / 左芙蓉著. --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188-0401-6

I. ①华… II. ①左… III. ①圣公宗—基督教史—研究—东北地区 IV.

①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5025 号

华北地区的圣公会

左芙蓉 著

出版发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64095215（发行部） 64095265（编辑部）

责任编辑：王志宏

版式设计：武俊东

印 刷：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787×1092 毫米 16 开 19.5 印张 400 千字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88-0401-6

定 价：66.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近百年的历史演变	7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传入及早期活动	7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发展及主要活动	12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	32
第二章 主要教堂与传教活动	37
第一节 主要教堂及其变迁	37
第二节 布道传福音	47
第三章 合一与自立	55
第一节 合一的开始与推进	55
第二节 自立的尝试与思索	63
第四章 主要学校与教育活动	70
第一节 华北教区的学校与教育活动	70
第二节 河南教区的学校与教育活动	113
第三节 山东教区和陕西传道区的学校与教育活动	121
第五章 医疗、救助及抗日救亡	127
第一节 诊所和医院及其活动	127
第二节 社会救助	136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服务	141

第六章 文字事工的开展	146
第一节 对中华圣公会文字事工的贡献	146
第二节 各教区的文字事工	154
第七章 主教和著名会长及信徒	181
第一节 外籍主教	181
第二节 中国籍主教	203
第三节 著名会长及信徒	219
结 语	235
附 录	238
后 记	308

绪论

16 世纪的欧洲曾发生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因此产生了一个新兴的教派即基督教新教,安立甘宗与信义宗、归正宗合称新教三大流派。安立甘宗(亦称“圣公宗”)是英国国教,安立甘会(亦称“圣公会”)是该教教会,其“最高首领是国王而不是教皇,教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按照行政区划分教区,用英语做礼拜,天主教的基本教义、主教制度和宗教仪式仍沿用不变”^①。宗教改革以后,圣公宗不仅在英国发展迅速,而且伴随该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广泛传播。17 世纪它开始在英属殖民地创立教会,从 18 世纪起,一批批传教士将它的影响扩大到世界各地,19 世纪中叶它伴随西方对华传教运动而传入中国。

圣公宗向世界传播主要通过圣公会的差会组织,圣公宗传入中国即是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三个国家的圣公会差会推动的结果。英国圣公会 (Church of England) 主要有两个差会,一个名叫传福音会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简称 S.P.G), 另一个名为“行教会”,亦称“英国布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简称 C.M.S)^②, 它们都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沈子高在论述“安立甘之沿革”时曾作相关介绍:“1701 年英传福音会成立,乃分头西去新大陆,东来印度、澳洲、中国(山东及华北教区)……1799 年英行教会成立,向我国之闽、浙、两广、桂湘及四川等区展开其工作。”^③ 美国圣公会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的差会称为国外布道会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简称 F.M.S), 它也向中国派遣了不少传教士,主要活动区域在上海、江苏等地。加拿大圣公会 (Anglican Church of

① 郭振铎主编:《宗教改革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340 页。

② 英国行教会最初由热心传扬圣经福音的一些地位平等的信徒和神职人员组成,是一个非神职的教会组织,不属于教会教派,主要以财政资助和专业训练的形式协助英国教会派遣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福音。据统计,“在其 200 多年的历史中,曾有超过 9000 名男女成员接受海外差遣”,参见刘喜松:《寻根——北海普仁百年医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73 页。

③ 《圣公会报》,1951 年第 40 卷第 1 期,第 4 页。

Canada) 亦有差会, 全称为“加拿大圣公会布道会”(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in Canada, 简称 MSCC), 它在中国的传教区域主要在河南。

上述差会的在华活动多效仿其母会, 如设立教区、实行主教管理制和圣品制度等。自 1844 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 (W.J.Boone, 右图) 在江苏、上海等地传教并建立第一个教区起至 1947 年, 圣公会在华设立的教区 (1928 年以前称为“辖境”) 共有 13 个, 它们分别是江苏教区 (1844)、港澳教区 (或华南教区, 1849)、浙江教区 (1872)、华北教区 (1880)、东川教区 (1895)、鄂湘教区 (1901)、山东教区 (1903)、福



文惠廉

建教区 (1906)、桂湘教区 (1909)、河南教区 (1909)、皖赣教区 (1910)、西川教区 (1936)、云贵教区 (1947), 1912 年中华圣公会成立以后又设立了 2 个传道区 (亦称“布道区”), 即陕西传道区 (1924) 和南宁传道区 (1947)。这些教区 (其分布如下图) 的负责人为主教 (亦称“会督”) 且长期由外国传教士担任, 两个传道区最初亦分别由外国主教兼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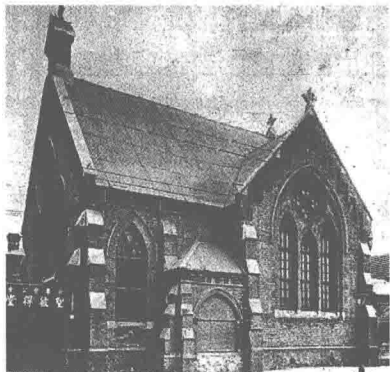


圣公会在华 13 个教区和 2 个传道区分布图

在各教区，最高权力机构为教区议会，负责人称为会正，由主教担任，教区议会的代表由教区内的会长和会吏组成，会长即牧师，会吏为见习牧师。^① 每个教区下设若干牧区，一个牧区设有多位会长，其中一位是“当家人”，叫做“监守”（或主任），为一个牧区的负责人。牧区内有若干教堂（包括主教座堂），各设大小堂会。通常，担任会吏一年后可以晋升为会长，但妇女最高只能任会吏，不能晋升会长。^②

圣公会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以基督教文化取代或改造中国文化。为此，他们不仅广建教堂传道讲经，发行报刊阐扬教义，创办神学院校培养传道人，还开办普通学校广泛影响中国人，并通过医疗卫生、慈善救助等活动争取了不少信徒。

在圣公会建造的众多教堂中，较著名的有上海圣彼得教堂（右图）、广州万福路救主堂、杭州信一堂、绍兴观音桥教堂、北京南沟沿救主堂、福州苍霞洲基督堂、仓前乐群路圣约翰堂（石厝堂）、岭后圣保罗堂、公园路圣三一堂、河南圣三一堂、四川阆中福音堂等。



上海圣彼得教堂

圣公会注重文字宣传，在翻译圣经、出版基督教书籍、发行报刊等方面不遗余力。以发行刊物为例，圣公会的刊物多种多样，既有全国性的，也有教区性的。除中华圣公会刊物《圣公会报》外，各教区如福建、皖赣和河南等教区还发行月刊，鄂湘教区的月刊时出时停，港粤教区亦有一种刊物，华北、桂湘两教区“有时亦见到每月出一单张。上海彼得堂、诸圣堂、保罗堂亦有四面之一页月刊，按月出版。此外或尚有其他刊物”^③，其中以《圣公会报》的影响最大。

圣公会在华开办的神学院校很多，如中华圣公会中央神学院（简称“中央神学院”）、浙江教区宁波三一神道院、华中大学神学院、福建协和神学

① 圣公会实行圣品制度，主教、会长和会吏为该会的三级圣品（圣职），被授予圣品成为神职人员者即为圣品人。

② 华南教区有例外，1944年该教区主教何明华(R.O.Hall)按立了一位女会长李添媛，因此引起诸多争议。

③ 参见《河南中华圣公会会刊》，1939年第20卷第1期，通告。

院等，其中最著名者当属中央神学院。圣公会开办的普通学校更多，而且又分为小学（包括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中学和大学。据统计，到1917年，圣公会初等小学校有491所、高等小学校85所、中学校33所、大学2所。^①这两所大学是指位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位于武昌的文华大学（该大学后与博文书院合组为“华中大学”），它们均由美国圣公会独立创办。除此之外，圣公会也与其他差会联合办大学，例如，燕京大学的前身之一的华北协和大学就是由伦敦会、长老会和圣公会等共同创办。福建协和大学也是由包括圣公会在内的六大差会合办，华西协和大学由基督教的多个教派参与筹建，英国圣公会是其中之一。

同来华的其他基督教差会一样，圣公会还开展医疗活动，建立了许多西医诊所和医院，如上海同仁医院（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建的第一座教会医院）和广仁医院、无锡普仁医院、杭州广济男女医院、宁波仁泽医院、慈溪保黎医院、临海恩泽医院、桂林道生医院、武昌同仁男女医院、宜昌美华医院、北海普仁医院、福州柴井医院、福清惠爱医院、普爱女医院、连江普孺医院、霞浦圣教医院、屏南潘美顾女医院、宁德妇幼医院、建瓯基督教男医院、建宁妇幼医院、莆田圣路加医院、华实产科医院、仙游圣路加医院、绵竹教会医院、云南府惠滇医院、平阴广仁医院、归德圣保罗医院、大同首善医院、安庆同仁医院、妇孺医院、罗源圣教女医院、河间圣安得烈医院、永清圣司提凡医院、安国圣巴拿巴医院，等等。这些医疗机构分布于中国各地。

在灾荒和战争期间，圣公会也曾开展一些赈济和战时服务，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其救助难民贫民和支援抗战的活动产生较大影响，一些外国传教士出于人道主义对中国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还有少数人以其影响和身份支持中国抗战，如鄂湘教区主教吴德施（L.H. Roots）、归德圣保罗医生包志德（R.F. Brown）、安国圣巴拿马医院护士长凯瑟琳·霍尔（中国名字为“何明清”）等。吴德施在1937年冬至1938年4月间利用其离华回美国的这段时间，做了大量的帮助中国人抗战的工作。“他在汉口的家事实上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援华国际友人的联络场所，周恩来、邓颖超、彭德怀等人经常出入他家，史沫特莱女士在他家中住了4个多月，并在此写出声讨日寇暴行的一系列战斗檄文。吴德施还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联合发起募集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由当时的国际代表送往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国际代表团团长就是他的女儿，当她和4名汉口圣公会的美国传教士到达八路军

^① 中华续行委员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5期，上海广学书局，1918年，第254-255页。

总部时,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将领亲切接见了他们并和他们合影留念。吴德施回国前夕,周恩来亲笔题词送他,并为他举行告别宴会”。^①包志德与何明清的相关活动在第五章有介绍。

总之,自19世纪40年代传入至1958年停止活动,圣公会在华历时一百多年,其开展的主要活动都与传教以及辅助传教的事业相关,正如吴德施在介绍中华圣公会时所说:“圣公会之工作与别公会大致相同,在布道工作之外兼办教育,医药,文字宣传等事业。”^②有圣公会传教士将传教与教育事业和社会服务比喻为人体与左手和右手,“徒有身体而无手不可也,徒有布道而无教育与社会服务亦不可也”。^③这些活动是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的组成部分,由于其具有强权政治的背景且被殖民主义利用,其影响也呈现出多面性,既推动了中国从传统向近代即近代化的进程,促使中西文化的相遇和接触,也导致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造成民族隔阂与对抗。^④

圣公会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可以分为五个大区,即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和华西地区,每个大区各有几个教区或传道区,如华东地区包括江苏教区、浙江教区和福建教区;华南地区包括港粤教区、桂湘教区和南宁传道区;华北地区包括华北教区、山东教区、河南教区和陕西传道区;华西地区包括西川教区、东川教区和云贵教区;华中地区包括皖赣教区和鄂湘教区。其中,圣公会在华北地区开始活动的时间较早,紧随华东地区和华南地区之后。1862年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到北京传教成为开端,1880年该地区出现第一个教区即华北教区,其他2个教区和1个传道区都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所建。同其他地区的圣公会一样,华北地区的圣公会也是以改变当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使其皈依基督教为终极目标,并为此广建教堂,创办多种报刊,出版大量书籍,四处讲经布道,大力传扬福音,同时热心开展教育、医疗、慈善救助等活动,以使更多的中国人改宗。另一方面,华北地区各教区所在地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如华北教区所在的北京是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山东教区所在的山东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和儒家思想创立者孔子的故乡,河南教区所在

① 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243页。

②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11期,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31年,第14-15页。

③ 《圣公会报》,1934年第27卷第5期,第3页。

④ 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47页。

的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曾是中国历史上 20 多个朝代的都城，“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荟萃之点”，陕西传道区所在的陕西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秦、汉、隋、唐、宋 5 个大一统王朝均建都于此，因此，在华北地区的圣公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面更广，其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深刻。

总的来看，华北地区的教区主教职务同样是长期掌控在外国人手中，以华北教区和山东教区最为明显，自创建至 1950 年，这两个教区的主教都是英国人；河南教区的主教共有 3 位，其中外籍主教虽为 1 人，但其任职时间长达 26 年，比后来的 2 位中国籍主教的任职时间之和还长；陕西传道区由华北教区外籍主教兼管达 13 年，不平等现象明显，不利于该地区圣公会的本土化。

自 19 世纪后半期传入北京至 20 世纪中期停止活动，圣公会在华北地区的历史近百年。在此期间，它不仅对华北社会产生多方面影响，其自身也因中国社会剧变而不断调适，深入考察华北地区圣公会的历史演变不仅有助于中华圣公会史研究的深化，而且对今日中国基督教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遗憾的是，对华北地区圣公会史的研究尚未引起当代学界的足够重视，相关研究较少。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正式出版的研究成果来看，论文数量有限且主要关注个别主教和教会学校，如董延寿的“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与洛阳文物被盗”，李巍的“加拿大圣公会主教怀履光”和“从传教士到汉学家——加拿大圣公会主教怀履光”，李瑞启的“北京私立崇德中学”，李友滨等人的“北平崇德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建立和活动”等。较为全面深入探究华北地区圣公会史的专著更是凤毛麟角，仅有一些相关著作涉及华北地区圣公会的某些人物和事件，如林玫美的《妇女与差传：19 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2011）中对传教士施约瑟的论述，魏克利和陈睿文的《万代要称你有福——香港圣公会圣马利亚堂史 1912-2012》（2012）中对赵紫宸加入圣公会的介绍，格雷（G.F.S. Gray）的《中华圣公会史》（*Anglicans in China: A History of the Chung Hua Sheng Kung Hui*, 1996）中对华北地区各教区的粗略研究，等等。因此，笔者希冀本书可以对此学术现状的改变有所贡献。本书主要利用中国大陆现存的不少中文文献和少量英文资料，通过对它们的收集与梳理以及对一些遗址遗迹的实地考察，再现圣公会在华北地区的历史脉络和主要活动。

第一章 近百年的历史演变

圣公会在华北地区的历史始于19世纪60年代,止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此期间共出现三个教区和一个传道区,其近百年的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1862至1879年为第一阶段、1880至1913为第二阶段、1914至1948年为第三阶段、1949至1958年为第四阶段。前两个阶段主要在晚清时期,后两个阶段则分别在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传入及早期活动

第一阶段始于1862年圣公会传教士进入北京活动,止于1879年华北教区建立前夕,亦即前华北教区时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英国和美国的圣公会同时在北京开展活动,英国圣公会传教士也开始到北京周边地区及山东等地传教,但总的来看,圣公会的宗教活动有限,其教育和医疗等活动的规模和影响较小。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圣公会在华传教活动从东部和东南部沿海逐渐深入中国内地,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很快出现该会传教士的身影。1862年4月包尔腾以英国使馆牧师身份到京,同年7月施约瑟(Joseph J. Scherëschewsk,右图)^①以美国使馆翻译的身份尾随而至,旋即从事一些与传教相关的活动。包尔腾在英国公使威妥玛(T.F.Wade)的推荐下成为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



施约瑟

^① 据河南教区主教郑和甫介绍,施约瑟为寄居俄国的犹太人,一向在波兰居住,幼时的生活及其家庭状况不详。早年即在美国读书,颇具语言天赋,精通英俄德法多国文字,对神学特别是新旧约原文完全明悉。成为圣公会会长后,施约瑟即来华传教。1859年到上海,1862年到北京并在此居留约14年。1877年10月在美国接受主教之职,随后赴湖北任职。1881年患全身风瘫症,1883年辞去主教职务。参见《河南中华圣公会会刊》,1936年第9卷第3期,第1-2页。

1865年，传教士顾维廉^①也来到北京协助包尔腾。起初，他们租用民房设立堂会并开办一所小学，施约瑟初到北京时曾到包尔腾的堂会讲道。1867年下半年，施约瑟在阜外大街路南建立礼拜堂并在附近设立小学，次年他与美国女传教士华素姗（Suan Mary Waring）结婚并开办了一处药房，药房主要由华素姗管理，在给中国患者用药方面，英国伦敦会的医疗传教士德贞（John Dudgeon）给予了华素姗不少的指教。此外，华素姗还在施约瑟开办的小学任教。施约瑟除传教外，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圣经翻译工作，主要将圣经译为中国官话。尽管付出许多，施约瑟在北京的早期传教活动并不理想，让他感到失望的是，“那些官吏和群集京都的候补官吏，都敌视轻藐基督教，人民对于宗教的态度又都依官吏为转移”。因此，“他的礼拜堂内，平均虽有四五十人聚集，但是他在侨居北京的时期内，总共也不过替约近二十人施了洗礼，却并不曾荐过一个人受坚振礼。这二十人中，多数均从乡间到来，以后便逐渐返回，终于音讯全无了”。在其开办的学校中，入读的学生也很少。于是，在1874年2月他致书美国差会，说明他自己在以往十二年期间对于“组织堂会的工作竟无显著的成效”，不配继续这一活动，要求把北京的工作交给英国教会。^②于是，1876年美国圣公会结束了在北京的活动。

包尔腾在北京的时间不长，1875年他被任命为港澳教区主教而赴香港任职，顾维廉（W.H.Collin，亦译为“顾惠廉”）接替其工作。

与此同时，英国圣公会又派遣传教士到山东。1874年10月，史嘉乐（Charles Percy Scott）和林披基（Miles Greenwood，亦译“吴梅理”）二人抵达烟台。这座城市在1861年8月之后已成为对外国人开放的口岸城市，此后不断有外国教会进入，以美国北长老会的势力较大。初来此地的史、林二人曾得到该会传教士倪维思（J.L.Nevius）在住宿、传教等方面的帮助。

最初，史、林二人以学习中文为要务。经过两年的学习，他们的中文水平大有长进。1876年，他们将在烟台租住的一处房屋作为会所，开始独立布道，同时也重视扩大基督教影响的其他机会，如参与慈善救济等。1876—1879年华北大旱，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省灾情严重，基督教传教士曾组织饥荒救济，史嘉乐等人“带着4000英镑的赈款进入山西。他们用了8

① 顾维廉是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受英国圣公会派遣到中国传教。1858年上半年他携其妻子到达上海，1860年底返回英国，1863年再到上海，同年携其全家移居北京，此后长期在华北地区传教，还撰写了《福音指南》（北京，1865年）和《圣经问答》（北京，1867年）等书。

② 麦雅各：《施约瑟主教传》，中华圣公会书籍委员会，1940年，第61页。

个月的时间，行程 3000 余里，在各地施济放赈”。^①

圣公会在华北地区的早期教务由浙江教区主教兼理，1872 至 1879 年禄赐（W.A.Russell）为浙江教区主教，因此他也是华北教务的负责人。早期的华北教务所辖区域较广，包括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东三省九个省份。1879 年禄赐病逝，1880 年史嘉乐回到英国被祝圣为主教，之后返回中国主持新成立的华北教区工作。

第二阶段始于 1880 年华北教区建立，止于 1913 年华北教区第一任主教卸职前夕，亦即史嘉乐主管华北教区的时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传教站和教堂增多、信徒人数增加、教会经历义和团运动巨大冲击后迅速恢复并进一步发展、山东和河南两地新设两个教区。

作为第一任主教，史嘉乐任职期间主要在以下几方面推动华北教区发展。（一）在山东多地增设传教点、扩大圣公会的影响、帮助山东教区建立；（二）在河北、天津、山西等地广建传教站和教堂；（三）在北京建主教座堂、医院和学校，逐渐完善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教区建设。

初任主教时，史嘉乐面临的是教区资金不足、人才稀缺、信徒寥寥等状况。最初七年里，“仅有二三英圣品人协助主教，此外有华人二位，而信徒之总数，增至百余人，领圣餐者共十有六人矣”。为改变窘境，史嘉乐利用 1888 年 3 月回英国之机，寻觅教士，募集捐款。1889 年 9 月，史嘉乐携新婚妻子返华，同行的还有鄂方智（Frank Norris）、艾立法（Geoffrey Durnford Iliff，右图）、马思彤（Alice K.Marston）女士和詹克森小姐（Miss Jackson）四人，他们是受史嘉乐的影响来到华北教区的，前两人后来分别从会吏、会长升为主教，后两人分别在北京从事医疗和教育等活动。



艾立法

山东是史嘉乐最早开始传教活动的地方，也是中国孔圣人的故乡，史嘉乐深知在这里传播基督教的重要性。1883 年他在烟台建立了一座教堂名圣彼得堂，次年发展了一些信徒。1889 年，他又选派两位能干的圣公会会长

^① 张子荣：“山西基督教社会事业述略”，《三晋文化研究论丛》（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220 页。

卞方智 (Francis Henry Sprent) 和伯夏理 (Henry John Benham Grown) 前往泰安长期传教。卞、伯二人先是租借灵芝街住宅 1 所并在此设立教会, 随后又在平阴南关租宅设立圣堂, 还“于泰安办学校收学生约 20 名, 其中有数位后升为山东辖境首先圣品者。此后 5 年间泰安平阴新泰肥城 4 县多有受圣洗者, 并有英国会长数人至山东同助圣工”^①。到 1900 年义和团运动前, 圣公会在平阴、泰安、东昌、兖州等地已经建立几处教堂。^②

1900 年义和团运动爆发, 山东首当其冲, 圣公会在当地所建教会陷于混乱。这一运动结束之后, 圣公会恢复教会, 重建教堂, 并且将其活动扩展到新泰、青岛、肥城、东阿、东昌 (聊城) 等地。由于华北教区下辖地域大为扩展, 一个主教已无法全面顾及, 于是在 1903 年山东省被辟为一个新教区, 艾立法被指派为主教, 泰安为教区中心, 之前所建的泰安灵芝街教堂作为主教座堂。

自 19 世纪末以来, 圣公会传教士先后进入河北、天津、山西等地。在河北永清, 早在华北教区建立以前即有圣公会的活动。1867 年顾维廉曾与在北京受洗的两名中国籍圣公会信徒到永清传教。初至当地, 顾氏利用医术吸引当地人, 以医布道, 圣公会在永清的活动自此开始, 永清也因此有“华北教区第一牧区”之称。到 1887 年, 永清“城内已有会堂一所, 地点在信徒陈宝琨宅中。后陈君遂将此宅让于教会, 且担任布道圣工。教会渐渐振兴, 迨 1892 年, 改筑圣堂一座, 落成祝圣, 命名圣米加勒堂”。^③ 进入 20 世纪, 圣公会在河北进一步发展, 从永清到河间、安国以及肃宁、博野等县, 均建堂设会。

圣公会在天津的传教活动开始于为当地英国侨民的服务。“1889 年初, 史嘉乐曾派白瑞屯会长 (William Bereton) 到天津征询英侨教友对在津设立安立甘会的意见”, 结果征得英侨的同意和捐款, 加之从英国国外布道会得到的一笔补助金, 圣公会最终在天津中街 (今解放路) 70 号建成教堂一处, “1890 年 11 月 2 日的礼拜天由史嘉乐主持献堂。自 1890 年至 1894 年, 白 (瑞屯) 遂长住天津, 在中街小礼拜堂主持英侨礼拜, 并随时赴大沽、塘沽、唐山及

① 中华圣公会编:《中华圣公会概况》, 中华圣公会, 1927 年, 第 32 页。

② 石经校:“泰安中华圣公会”, 引自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第 213 页。

③ 《圣公会报》, 1924 年第 17 卷第 20 册, 第 20 页。

铁路沿线各地,在英侨中进行传教活动”。^①后来,随着参加礼拜人数的增加,小教堂容纳量不足,史嘉乐又开始募集钱款并聘请英国建筑设计师建立新教堂。1903年,新教堂落成,取名“诸圣堂”。1894年,白瑞屯因病返回英国,由鄂方智接替其在天津的工作。1898年,圣公会派鄂方智到北京做史嘉乐的助手,艾立法负责天津的教务直到1903年赴山东任教区主教。此后,史吉维(J.H.Sedgwick)接手艾立法的工作直到1916年。

圣公会在山西和奉天也开展活动。早在19世纪末圣公会就已在山西传教,但发展较慢。1912年,华北教区在奉天建造教堂、成立教会。整个教会地处奉天北市区二纬路31号院,这里“有二层楼房一所,共12间,占地面积180平方米;平房一所,共4间,教堂一所,共5间,占地面积192.9平方米”。该教堂是专为满足英美等外国侨民的宗教生活而建,取名“圣巴拿马教堂”。^②

成为主教后,史嘉乐最初几年的常驻地仍在烟台,从1883年开始他才真正在北京定居下来。此后,他除了主持全教区的宗教事务外,还在北京筹建主教座堂,支持教会办教育和开展医疗服务。经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之后,华北教区之前开展的各项活动迅速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崇德男学堂和笃志女学堂从以前的只有初小到20世纪初增设高小,再到民国初年增设中学并设附小。医疗活动也从早期的药房发展为诊所再发展为医院。1907年建成的新教堂比以前的旧教堂扩大很多,作为华北教区主教座堂,它可同时容纳600多人礼拜,加上附堂容纳的150人,其总容量为750人左右,这在当时的确算是一座不小的教堂了。

总之,自华北教区建立特别是自1889年至1913年的二十多年间,圣公会各方面的事业总体来看是发展的,呈曲线上升态势。据相关统计,“自1889年至1900年,此11年中华北辖境逐渐扩张,华人之信教者,已由200名增至1000名,中领圣餐者自60名增至500名,各处建有学校,及有专用为圣堂之房屋。该境之圣品人有艾立法会长(后升为山东主教)、鄂方智会长(后升为华北主教)及孟孙二会长、卜会吏”。而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的十多年间,华北教区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更多,它不断增设教会学校,以基督

① 参见何风德:“圣公会在华北教区的开创和发展”,引自天津宗教志编辑室编:《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天津宗教志编辑室,1986年,第105页。

②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辽宁省志》(宗教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7页。

教影响学生，栽培中国传道人，派立华人会长。据相关资料载，这一时期“已派有2位华人为会长，又另派2位英国女士为会吏。此12年中男女学校增多，在北京设有崇德、笃志、培华三校，更有女传道学校，其中毕业者已有数名”，其“医务事业，更有显著之成绩”。^①

需要提及的是，继1903年山东从华北教区分出而自立教区后，1910年加拿大圣公会设分会于河南省并使其成为新教区。此后，华北教区所辖区域仅有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奉天五省。此外，到1913年，史嘉乐任华北教区主教一职已有33年。因其年事已高，他提出辞去主教职务，鄂方智继任其职，成为新一任主教。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发展及主要活动

1914—1948年为华北圣公会史上的第三阶段。对于华北圣公会而言，这是一个发展机遇与挑战困境并存的时期。进入民国，由于“民国肇建，排教之风，亦已扫除”，基督教的发展具有较之以前有利的环境，圣公会在华北的事业也日渐兴盛。与此同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不断、内战与对外抗战等也使华北圣公会受到挑战和冲击。增设陕西传道区、各教区和牧区发展迅速、教会本土化加快、信徒在数量上和构成上发生大变化、不断回应民族主义运动是此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华北教区

作为华北地区的第一个教区和最大的教区，华北教区在进入民国之后的发展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陕西传道区的建立和发展。1916年，葛丕六、浦化人二人受中华圣公会传道部指派到陕西传道并筹划成立陕西中华圣公会，将会址设在西安北大街西华门附近（上图为西安圣公会大门）。



西安圣公会大门

^① 中华圣公会编：《中华圣公会概况》，中华圣公会，1927年，第27—28页。孟孙二会长指孟鹤龄（Harry Vine Norman）和孙查理（Charles Robinson）。前者自1891年来华，先暂居烟台，次年春转至北京，在救主堂被授予会吏圣职，1893年升为会长，旋即赴泰安，发展当地教会，之后还常到永清和河间各处传教。后者于1897年来华，1899年成为会长，辅助孟鹤龄主理永清教务。卜会吏指卜克斯（Sidney Brooks）。三人均亡于1900年。